

朱靖江 主编

视觉

人类学论坛

(第三辑)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中央民族大学2016年度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之民族学学科经费资助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民族影视与影视人类学专业委员会
论文集刊

朱靖江 主编

视觉

人类学论坛

（第三辑）

视觉人类学论坛编委会

鲍江 陈学礼 郭净 雷建军 苏发祥 朱靖江



九州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视觉人类学论坛. 第三辑 / 朱靖江主编.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7. 4

ISBN 978-7-5108-5173-5

I. ①视… II. ①朱… III. ①视觉—文化人类学—研究 IV. ①C9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59962号

视觉人类学论坛 (第三辑)

作 者	朱靖江 主编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8.75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5173-5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代序：影视作品的人格^{*}

罗红光

跨专业对话与合作应该是一种潮流，不管是来自官方的、还是我们付诸实践的，包括那些已经形成完整学术理论体系的，都可以在这种跨专业的互动中获得更好的完善和提升。我们对生活体验和情感历练的表达，一直以来都是以文字为主体。这些与我们联系紧密的生活实践，实际上也和我们的文字交流习性息息相关。在文字传承的几千年间，人们已经习惯将自己的各种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感受凝练成一篇论文或者一本著作。而在各种感官所呈现的世界里，无论从科学研究的角度也好，从资料整理的角度也罢，毋庸置疑，使用文字已经成为我们习惯的一种表达方式。

实际上我们会发现作为一个个体的人，无论在学术研究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感官所接收到和传递出去的信息，比我们所写的文字和我们的阅读要丰富得多。如果梳理一下我们的阅读体验和视觉以外的感官所接收到的信息，我们会发现那似乎是一个不能穷极的量。影视实际上是满足了相当大一部分人的这种“觉”的释放。法国学者塞托在《日常生活实践：实践的艺术》中指出：“一种在生活当中不可实践的实践，在影视作品中的表现却具有无限种可能。”像作为个体的我，之所以会与影视产生瓜葛，除了人类学课程里将其作为一种方法学习它，也是因为一次机缘。1999年底美国历史学家杜赞奇访问北大，正好有一些想法特别想跟他谈一谈。我在1994年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参阅过他关于中国的著作，其中有些学术问题需要当面聊。所以我决定把那次对话拍摄下来。拍摄极其单纯，就是不间断地

^{*} 本稿是应邀参加第三届“视觉人类学与当代中国文化论坛”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民族影视与影视人类学专委会2016年年会上的主旨讲演稿。在此特别感谢主办方同仁及朱靖江教授的邀请。

记录。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截至目前已经拍了 32 部，最近的一次拍摄在数码人类学专家和国际传播学专家之间进行，拍摄是跟专业的影视导演合作共同完成的。

《数码人类学》一书的作者，丹尼尔·米勒是英国皇家院士、人类学家，他非常关注数码时代对于人类学研究的前景。他于 2016 年 10 月访华，我邀请了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媒学院的陈卫星教授出面与他展开了一场视频对话。一边是传媒学者，一边是人类学家，双方围绕一个共同的主题——“新媒体时代下人类学的理想与前景”。围绕这样一个给定的命题，对话双方就像当初第一部《学者对话》的设计一样来展开。记得当年我和杜赞奇的对话命题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那个时候对于草根、地方社会等这样的关注远远超越于大而空的国家话语。

不同学科背景的对谈双方坐在一块儿谈论，可以反映出很多问题。当时很多知名学者如同电影明星，习惯于接受采访，喜欢被观众注目，而在我的对谈里会特别强调，嘉宾双方的交流是一个平等的对话过程。为什么这样说呢？在早些的时候，我也接触很多老前辈，他们都很有想法，在各自的学术领域都有很高的造诣，很遗憾因为语言的问题，在与国外学者交流时会遇到一些阻碍。他们的好思想表达不出来，所以我想用这种对谈的形式，找最好的翻译，让他们坐在一块儿，完全表达出他们的思想，没有语言上的顾虑。因为我想获得的是他们的思想碰撞，而不是所谓的“名人访谈”。这时我们会发现使用母语谈书论道的时候大家都非常自如，而且可以跟国外的学者实现真正的思想碰撞。那种用醋溜的语言去跟国外学者交流的情景，不自在的对话情况发生了重大的改观！

《学者对话》是在一个给定的命题下，大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切磋。我在对谈中会非常强调三跨，一是跨文化，二是跨专业，三是跨国籍，通过这种“跨”来减少同专业心照不宣的话语，并在话语实践层面谋求一种创新。这意味着他首先是一个具有独立研究的“他者”；其次，研究有成的学者也成就了他的自成一说的学术人格。这三个“跨”就会导致对话双方在交流时顾及对方能否很好的理解，履行了一种你来我往的沟通理性。对话时长的一般设计是 1 到 2 小时。从“他”的学术脉络来说“他”的概念，从“他”的知识系统里来讨论，争取让不同专业的对方能听懂“他”在说什么。双方在对谈的这种方法设计中达到“理解”的实践。用最近的案例来说：中国的传媒学专家会提到新媒体的出现是否会导致人性的变化，双方就此展开讨论。就是这种围绕共同关心的问题，用影像来呈现这种理解的过程，确实是一个极好的方式。事实上这种合作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我相信视觉人类学

也有同样的问题，即影视所特有的专业技术和人类学的方法如何结合的问题。影视和人类学不是一个简单的相加，不是说你拥有了影视技术就可以进行人类学的拍摄。它需要你长期的田野研究，把这两种“术”如何融合成一种“道”，从“术”到“道”，这需要长期的学术训练，也是一个学术历练、学术实践的结果，并不是书本当中能学出来的。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围绕商品生产的劳动组织了人。甚至在那个“劳动异化”的概念中，劳动工具组织了人，劳动者的主体性荡然无存。换一个说法，我们说人的异化，就当下而言，我们也被异化在这个新媒体时代的技术和话语体系中。我们现在已经离不开手机了，手机俨然变成了我们的手的一部分、眼睛的一部分、耳朵的一部分，甚至思想的一部分。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它已经让我们异化在手机的工具之中。所以说新媒体时代会不会导致我们的人性也发生一些变化这个问题非常现实！英国学者丹尼尔在世界6个国家作了长时段的这类研究，也写过《数码人类学》《社交媒体》等著作。此次来中国的几场发言中，他也都在围绕这样的话题。面对传播学专家的判断，他辩称新媒体会导致我们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发生重大变化，这个时刻“他者”已经不再是那么遥远的了。用笔者的话说，遥远的比邻，身边的他者。在新媒体时代，会使这个空间发生重大转变。这个世界不再是我们人类学以前说的那种遥远的、封闭的、浪漫的村落，而是很有可能就在我们的手机上实现的沟通，实现一个圈，一个群体，甚至是一个虚拟社区。

虽然如此，丹尼尔说，在他的研究里发现：人们在如何使用、如何选择群体和工具的时候，他的主体性仍在发挥作用，并没有因为新媒体时代，世界就真的变成平的了。他说：深入调研后发现，人们仍然按照自己的审美和自己的道德去做出一些重大的选择，所以说形式上可以是平的，但是在行为层面上，在具体的实践层面上，人们还是会根据自己的一些传统的价值观来互相聚集，形成一个群、一个圈什么的。从这个问题给予我们的启发来说，传媒学的专家会用他们的实践来传播其想法，然后以人性趋同的思路来对质人类学的文化特质论；人类学家则会用他自己的田野来解构传媒学专家“世界趋同”的预设。可见这样的一个小时里，会谈到很多有意思的问题。然后还会有像我们所说的：我们的研究对象是鲜活的，有主体特征的。譬如说，作为一个拿摄像机的人，难道是“客观”到没有主体特征了吗？这是我曾经提出的一个问题，从答案来说主体性当然是存在，而且起作用的，否则我们的评奖结果要么一律是麦当劳的“薯条”，要么都是一等奖获得者才对。

所以，回到我的主题来说，这个“他”是有人格的。我留学时的一个同窗——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的张展鸿教授，曾经通过照片来研究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真正本土人的阿依努。他从日本明治维新时留下的很多照片资料中，分析那时研究阿依努的一批日本学者用什么样的角度，什么样的光等，他就发现这些照片的拍摄者们会故意让那些作为拍摄对象的阿依努侧着脸，以突显他的高鼻梁，用光讲究让阿依努的浓眉大眼和浓密头发能突出一些。那是一个黑白摄影的时代，照片的拍摄者有他自己的文化观念在其中。他要突出阿依努和大和人种不一样。我们知道仅从五官上来说，大和人跟我们汉人是很像的，阿依努却是深眼窝、浓眉毛和重头发，用这样的拍摄方法能清楚地呈现阿依努的不同。之所以会这样表现，一张照片可以让我们清楚地看到那张照片背后拍摄者所承载的文化。研究者根据这样的分析发现：原来在拍摄他者的时候，拍摄者自己的文化会发挥很大的作用！这种锁定目标的观察视线特别像我们平常所说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所以研究者通过照片，来分析拍摄者的文化，进而分析拍摄者的个人人格、学术的风格也包含在其中。那么，什么东西会促使研究者用这样的眼光去看待这样一张照片呢？我认为其与人类学的自我反思性——“他山之石，意在自我”的方法论息息相关。这就回到我们开头所说的“觉”，你可以调动你的视觉、触觉等，不光是你的文字，所以其实人们在捕捉对象的时候，发挥了很大的自我身体的能量。为什么我们会对视觉那么感兴趣？就是因为视觉所给予的信息完全超越了文字。文字能给予我们抽象的分析，但是文本性思维是讲逻辑、讲究因果关系的。而我们在讲空间思维的时候，像中国社科院民研所的庞涛教授提倡的“学者电影”，它是一个集立体感、非线性、主体性为一体的空间，如果使用文字，很多信息将会被阉割掉。跟前面列举的学者解读照片所作的分析的状态一样，很多东西也会被文本化简约掉。可是在呈现视觉作品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作品所给予的信息都是完整的。这些信息如果应用于读者，应该是非常鲜活的。读者也会因此引发属于自己的思考，所以我们说拍摄的对象是有主体特征的，是有其文化人格的。而我们的拍摄者同样也是一个文化主体，也在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包括我们的读者，他们也会有自己的视觉，有自己的灵魂融入其中去阅读这样的视觉作品。

所以我觉得这三个主体综合起来，才算是我们视觉人类学说的人的主体特征。从结论上来说，我们非常理性地来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去研究拍摄时光应该怎么用？构图应该如何？这是一个很科学、很技术的问题。如果只是用科学理性的思

维，又会回到我们提到的人性那一部分，很可能被删除。因为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是不要求人有主体性的，“我”这个字一定要用某种方法或技术去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要通过一套技术手段“去我化”以求“客观”，让所有的人都能用统一方法去验证这个研究对象如何。其结果当然不是证实就是证伪，因为方法是一样的，这时候的你只是一个操作者，你的职业操守告诉你，严格地掌握操作的技术和方法，你自己的思维不能应用于其中，只需要科学理性来处理。科学理性需要的是去除个体所拥有的人性那一部分。可是我们在拍摄作品时，事实上有关拍摄者的“他”的人格和“他”承载的文化都是抹除不了的。所以如果用科学理性来处理的话，那些影像作品是非常冰冷的，而不会给大众带来感官上的触动。所以，我们不需要去纠结影视到底是科学还是艺术，其实二者始终都是融合的。科学到了最高境界的时候，不管是宗教还是艺术，它们都是可以对话的。不像我们单纯讲的唯物主义，看不见的便不存在，其实世界不是这个样子的，其实它是一个充满了“觉”的世界。

实际上科学家到了非常抽象的层面，他的想象力要大于他的唯物的感官。所以一个好的导演创作的作品（如刘湘晨导演的作品），你会发现技术以外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包括我们在文字作品中的“非他莫属”的那种感觉，才是我们在影视作品中应当挖掘和提倡的，拒绝那种批量的、麦当劳式的知识生产。所以我们不必纠结技术分工如何，我鼓励大家可以像我的《学者对谈》中的那些人一样，跨专业地互惠、互利和互动。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所有问题都不是一个专业能够解决的。现在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资源和利益追求，但是引发的问题则是社会的、公共的。哪怕是一个养老问题，也需要很多专业的专家来共同设计。如果没有老人能进入对话、进入养老的话语系统中来（像云南大学的陈学礼、中山大学的邓启耀，他们尝试将话语权还给当事者的影像处理），那么这个设计则不够完整。缺乏对话能力的影像民族不具备其文化的代表性。古人讲“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好像你就不能知道为什么鱼在那里乐，其实庄子是可以通过自己的感官来呈现鱼儿欢快地畅游那样的镜头感，也是借助“他者”的力量呈现自我的感受。同理，还是庄子的话，“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几千年前古人讲的话，我们当代人仍在讨论，似乎都还没有讨论明白。黑格尔比庄子还要晚得多，所以我们应该对自己的文化有自信，不仅要理性技术地处理很多呈现现实的技术性障碍，更重要的是作为研究者，也作为作者，要用你的人格，你独有的灵感，来呈现出具有你的特色的作品！我相信：就因

为你尊重了你的文化，你看到了你的文化审美，别人才会知道世界是多样的，否则我们就会变成单线式的、圈养起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了。很多社会现象、社会问题，当把主体放置到一边不顾，既让政府很沉重，也丧失了自我！我们常说应该保护文化，文化应该怎么保护呢？不是让鲜活的文化博物馆化，除非是资料，你要把它放在生活里，让它的人格和它的主体性有一个很好的发挥空间，这样文化才会活得像自己，才不会因为新媒体时代而导致异化。

（罗红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2016年11月22日

目 录

上 篇

哈佛—皮博迪探险队的人类学遗产

——新几内亚田野作业的视觉方法创新与伦理反思…………… 梁君健 3

人类学“观察电影”及理论构建…………… 徐 菡 23

论自民族志纪录片——以罗斯·麦克艾威的作品为例…………… 孙红云 36

以电影为切入点的民族志研究进路——谢里·奥特纳

《非好莱坞：美国梦日暮西山之际的独立电影》评介…………… 李荣荣 49

文化与影视的审美互动——人类学纪录片的审美创造探究…………… 李文英 58

中国文化人类学纪录片的现存问题及发展对策…………… 赵 鑫 69

呈现“他者”的脉络——民族志影像的意义建构与传播潜力…………… 熊 迅 82

民族志电影的剩余素材…………… 陈学礼 92

记忆的发掘——动画式纪录片之探索…………… 郭春宁 100

视觉人类学视野中的“影音文献”…………… 朱靖江 118

下 篇

花腰傣三部曲与影视人类学的时间厚度	吴 乔	135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微纪录片传播与当代中国文化建构	牛光夏	148
数字时代博物馆影音文件开发与应用	刘 凡	156
从申遗片到纪录片——记忆的复数性与表象化	祝昇慧	172
传统村落的现代表达		
——以纪录片《记住乡愁》的人文关怀为中心的讨论	宋 颖	192
口述影音的采录与使用		
——“阿诗玛”传承人与“初民”展览馆的实践	巴胜超 马媛媛	204
对近年藏地电影发展的几点思考	朱晶进 赵忠波	218
社区影像研究的深化与拓展	刘广宇	243
社区村民影像与文化自觉	徐何珊	252
参与式影像与我国西南地区的乡村文化建设	刘 涛	267
文化变迁场域中的人类学影像表达	王海飞	277

上
篇



哈佛-皮博迪探险队的人类学遗产

——新几内亚田野作业的视觉方法创新与伦理反思

梁君健

摘要: 1961年由罗布特·加德纳主持的哈佛-皮博迪探险队是当代人类学探险活动的典型代表,多学科和跨媒介的人员组成让这次田野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图片民族志和人类学电影的理论和方法上产生了显著的突破。《战争的庭院》利用摄影媒介的传播特性,配合篇章结构和文字说明,营造了理解达尼文化的内部视角和感知渠道;《死鸟》则体现出影视媒介叙事特性与符号/表征人类学之间的结合,加德纳在田野拍摄中主动思考和积累叙事与表征资源,成功地呈现了达尼文化的整体特征。这次人类学田野工作和影片拍摄过程中还体现了多层次的田野伦理问题,揭示了人类学家所秉持的中立价值、文化整体观和文化相对主义在不同情境下可能带来的双重后果。

关键词: 哈佛-皮博迪探险队;加德纳;《死鸟》;视觉人类学;田野伦理

人类学探险活动兴盛于19世纪后半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达到高峰。在工业革命之后的西方现代国家体系支撑下,这些探险活动由自然历史类博物馆等学术机构组织和支持,有力促进了人类学从“摇椅”时代向“田野”时代的转型,为这一学科的资料收集和方法论的成熟奠定了基础。其中,较为有名的人类学探险活动包括了剑桥托雷斯海峡探险队和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所组织的系列探险活动。随着20世纪20年代马林诺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开创了英国社会人类学派尤其是田野工作的方法论之后,长时间的以个体人类学家为单位的田野参与式观察代替了短期的以团队形式收集文化证据的传统方式,人类学探险活动开始降温,当代人类

学家对这些活动中的殖民主义和文化掠夺也展开一系列反思。

二战之后，随着旧殖民体系的崩溃和全球化的进程，传统的人类学探险活动日益式微。然而，1961年由罗布特·加德纳主持的哈佛—皮博迪探险队在新几内亚中部山地展开的为期半年的人类学田野工作却取得了巨大成功。除了耳熟能详的经典影视人类学作品《死鸟》之外，还有含金量很高的系列成果，在形态上包括了影像、民族志、日记、新闻报道等。

哈佛—皮博迪探险队在新几内亚内陆高地所展开的人类学田野工作和获得的丰硕成果，既与二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人类学理论的当代演进息息相关，也受到了新的田野技术和媒介环境的显著影响。人类学家 Edwards 认为，虽然哈佛—皮博迪探险队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系列科学探险在跨学科和多方法上具有一定的类似性，然而，它更富人类学的整体观念和持续理论探究，以及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的人类学语境下成功的方法论创新，拓展了田野工作中人类学家的个体视角（Edwards, 2007）。随着这次考察不断丰富的文字和影像出版，尤其是加德纳本人的田野日记在 2006 年的公开，而另一位重要成员卡尔·海德退休后仍然活跃在人类学领域，这让我们有机会重返田野现场，探究哈佛—皮博迪探险队的理论取向、田野方法和伦理反思。

一、哈佛—皮博迪探险队的过程、特征及成果

1. 探险队的组建缘起

哈佛—皮博迪探险队的建立，来自内外两个方面的原因。新几内亚是世界上仅次于格陵兰岛的第二大岛屿，面积 78.6 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我国东三省面积总和。该岛的原住民为巴布亚语系的众多种族，19 世纪起，西新几内亚成为荷兰的殖民地，并持续到二战之后。随着殖民体系的崩溃，荷兰殖民当局对西新几内亚的局势十分忧虑，一方面希望通过人类学家的科学研究更多地了解当地好战的土著居民并帮助他们完成现代化的转型，另一方面则希望获得联合国和美国对于殖民宗主国地位的支持。因此，殖民当局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派出代表团来到美国，向年轻的美国人类学家们发出田野研究的邀请。

对于加德纳来说，接受荷兰殖民当局的邀请，组织探险队赴新几内亚的内陆地区展开人类学研究，则与他自己长期以来的学术和创作思考相关。当时，加德纳已

经在哈佛获得了人类学硕士学位，并完成了大部分博士课程。20世纪50年代加德纳制作了两部关于北美原住民文化的纪录短片，并帮助约翰·马歇尔剪辑了人类学电影《猎人》。同时，加德纳还深受英国格里尔逊领导的纪录片学派的影响，尤其喜爱怀特的《锡兰之歌》中对于文化的视听呈现方式。这一切都让他产生了自己拍摄一部关于原住民文化的纪录长片的打算。另外，越战给美国学术精英和社会文化带来的影响也同样促使加德纳对西方社会文化进行反思。他将前往一个陌生的石器文化社群视作一种对现代生活的逃离，因此他“迫切地期待在西新几内亚寻找到一个完全传统的社区……在这样一个与我们自己社会完全不同的语境中去探寻对于人类暴力行为的更广泛的理解”（Gardner & Heider, 1969：前言）。

抱着这样的预期，加德纳接受邀请，于1961年2月先行飞往新几内亚踩点。他首先考察了岛屿南部的阿斯玛特海岸，但由于这个地区的原住民已经被西方文化显著影响，加德纳认为并不符合自己的预期，因而继续深入内陆，来到中部高地达尼人聚居区。达尼人在传教士的资料中被描述为一个凶残的原始民族，加德纳和达尼人的第一次接触也充满了警惕和幽默。由于荷兰当局此前不久曾经通过巡警队告诫达尼人停止他们的部落战争，因此当他们在瞭望塔上远远地看到加德纳到来之后，大多数人逃回了自己的家中。加德纳只能请翻译告诉少数留下来观望的人，希望和部落的头领（big man）交谈。很短时间之后，加德纳就决定选择生活在格兰特谷地的这群达尼人作为田野工作对象。加德纳后来说，达尼人“纯粹”的石器文化生活方式打动了。同时，加德纳事先准备的贵重礼物让当地人同意接受这群西方人住在他们附近，探险队的工作顺利开展。

2. 多学科跨媒介的田野工作

19世纪末期的剑桥托雷斯海峡探险队被视为第一个人类学领域内跨学科的探险队，它的跨学科特征主要体现在探险队成员的学术训练基本涵盖了原始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而这支探险队所取得的学术成果也成为英国社会人类学的滥觞（Upadhyay & Pandey, 1993）。半个多世纪之后，加德纳所组织的这支探险队同样具有背景各异的成员，并且形成了不尽相同的跨学科特征。

除了作为摄像师和人类学家的加德纳自己之外，哈佛-皮博迪探险队成员还包括自然历史学家和文学作家彼得·马修森（Peter Matthiessen），他负责为这次探险撰写日记和报告文学；哈佛大学的学生迈克尔·洛克菲勒（Michael Rockefeller）

和萨缪尔·普特南（Samuel Putnam）从事静态摄影和声音录制，是加德纳的助手；《生活》杂志的著名摄影师艾略特·艾力索方（Eliot Elisofon）在中间来访一周，负责充实静态图片的拍摄和报道；Jan Broekhuijse 是来自荷兰殖民政府的人类学家，负责在前期从事这支探险队和达尼人的翻译和沟通工作；殖民政府雇佣的植物学家 Chris Bersteegh 在 5 月加入探险队，从事一周的短期工作，进行当地植物系统的辨识。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博士生卡尔·海德（Karl Heider）是这支探险队的“专职”人类学家，负责研究达尼人的物质文化、社会结构和信仰习俗等，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撰写整体民族志，并在必要的时候充当加德纳的摄影助手。

从上述的名单可以看出，相较于此前大多数的田野工作都由单一的人类学家完成，加德纳在组织探险队的时候充分考虑到人员构成的跨学科背景和多媒介能力。1961 年 3 月初，探险队的大多数成员抵达田野工作地点，并选择了距离 3 个聚居区较近的林地边缘搭建了帐篷营地。在 6 个月的田野工作中，加德纳赋予了探险队成员充分的自由，面对相同的人群和同样的事件，每位成员都可以自行选择观察和记录的方式，晚间回到帐篷营地之后再展开充分讨论。由于知识背景和媒介手段的多样性，探险队所发现和记录的文化数据和资料超越了对于单一文化群体的简单描述，具备了透彻的多面性，具有方法论的革新意义，确保了高质量学术成果的诞生。

3. 探险队的主要成果

1961 年 8 月底，探险队的田野工作结束，加德纳带着大多数成员回到美国，而卡尔·海德则继续在当地进行田野工作，除了中途回到哈佛半年之外，他个人的田野工作一直持续到 1963 年 12 月。在这期间，加德纳用一年半的时间剪辑完成了《死鸟》的两小时版本，返回西新几内亚试映之后，回到美国完成了最终的 84 分钟版本，由非营利教育纪录片出版机构 DER（Documentary Educational Resources）发行。除此之外，卡尔·海德在第二阶段的田野工作中还拍摄了甘薯种植、房屋建造等达尼人的物质文化影像资料，并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制作了两部人类学纪录短片《达尼甘薯》（*Dani sweet potatoes*, 19 分钟，1973）和《达尼房屋建造》（*Dani houses*, 16 分钟，1973），同样由 DER 发行。

这次人类学探险活动的文字民族志的出版相较于《死鸟》的面世更晚一些。除了少量的文章之外，关于达尼人的第一本民族志是海德以自己的博士论文为基础的